

『千岁丸』上海行

■ 冯天瑜 著

『史学五种（四）』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千岁丸』上海行

冯天瑜 著

史学五种（四）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岁丸”上海行/冯天瑜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5

名家学术

ISBN 7-307-04993-7

I. 千… II. 冯… III. 上海市—地方史—史料—1862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647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26.75 字数: 38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4993-7/K · 289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冯天瑜

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晚清经世实学》（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

■ 史学五种 (一) 文化守望

■ 史学五种 (二) 中华元典精神

■ 史学五种 (三) 辛亥武昌首义史

■ 史学五种 (四) 『千岁丸』上海行

■ 史学五种 (五) 『封建』考论



“史学五种”前记

承蒙武汉大学出版社美意，笔者得以从近二十余年由多家出版社印行的习作中选编五种(《文化守望》、《中华元典精神》、《辛亥武昌首义史》、《“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封建”考论》)，合为“史学五种”，奉献给读者诸君。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我国人文学界沿袭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柳诒徵、钱穆诸先哲在“后五四”时期草创文化学及文化史学的余绪，借鉴海外前沿成果，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厚资源，展开文化学及文化史诸论题研讨，构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与此间展开的热烈文化讨论相为表里，不少学人潜心撰构，文化哲学、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各种文化专题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生发，对于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外文化交互关系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哲思，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大有拓展。笔者躬逢其盛，追随前辈、时贤，见证并参与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建设过程，勉力充任一个未敢懈怠的施工匠人。

二十余年来，笔者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有所议及，陈述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月华集》、《人文论衡》等几种论文集和《中华文化史》上篇之中，今次择其要者，汇成《文化守望》一册。

笔者考析中国文化演绎史，注目于“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故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我们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笔者拟名“元典”，试图探索中华元典的形成及诠释过程。“晚清”是



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时期，是我始终不渝的关注重点及学术研究的展开部。在晚清文化研习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这些尝试性议论，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一册。

任何一种文化均受惠并受制于特定空间提供的生态环境，文化研究理当彰显地域特征，这是把握文化“一”与“多”、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所必需的劳作。笔者鄂籍，二十余年来一直参与湖北省地方志、武汉市地方志的修纂，并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这正是现今开始盛行的“口述史学”的早期尝试。

1998年以来，笔者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讲学并从事研究，得以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并潜心开掘异域史料，努力演运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三条做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由此进行中、西、日文化比较，将社会转型研究向深广处拓展。《“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为这方面的结集。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笔者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近年来更设立专题，详加研习，曾通过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民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今次收入的《“封建”考论》，用力于“知识考古”，探究“封建”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马克思封建原论，揭示现代中国流行的泛化封建观的弊端，并提出改订建议，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供较稳妥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

冯天瑜

2006年4月6日于武昌珞珈山麓

(论及王国维)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序 曲

公元 1862 年 6 月 2 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五月五日）^①，上海吴淞口，阴霾笼罩，细雨霏霏，从西南方远处，不时传来闷雷式的炮声。在水天浩茫的扬子江^②出海口，一艘西洋式三桅船鼓帆驶入黄浦江。

与十余年来常常穿梭于此的只挂一国旗帜的西洋船舶不同，这艘帆船高悬三种旗帜：前樯是荷兰三色旗，中樯是英国米字旗，这都是当地人较为熟悉的，而后樯飘扬的白底红玉旗，即使吴淞口一带久历海事者也未曾见过，只有曾经渡航日本长崎的商人才知道，那叫“日章旗”，是日本船舶的标志。^③

在万舸云集、洋舟翩至的上海港，这艘三桅帆船无论就吨位还是就形制而言，都不起眼，但它的到来却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

它刚刚在黄浦江靠港，一家英国人办的英文版《奴-斯·卡

① 以下，正文用阿拉伯数字记公历年、月、日，括号内以中国数字记中国及日本年号及阴历月、日。一般在日本的活动记日本年号，在中国的活动记清朝年号。

② 长江在江苏仪征、扬州一带古称“扬子江”（因扬子津及扬子县得名），近代外国人通称长江为扬子江，中国人也沿用此说。

③ 日章旗又称“日之丸”，曾是日本船只使用的一种旗帜，1854 年（安政元年），江户幕府规定，以其作为“总船印”（识别日本所有船只的标志），自此，日本船舶皆悬日章旗。明治维新后，日章旗作日本帝国国旗用，但并未经过法定程序。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联合国占领军一度禁止悬挂日章旗，但以后日本仍以之作国旗用。1999 年 8 月，日本国会正式通过议案，将“日之丸”法定为日本国国旗，同时将《君之代》法定为日本国歌。



伊那·海拉尔德》报便派记者登舟采访，获悉此船名“千岁丸”，是江户幕府^①自17世纪初叶形成锁国体制后，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节团乘坐的船只。该报随后发表新闻稿称，坐“千岁丸”访沪的日本武士正演绎一个“传奇物语”（传奇故事），也许预示着日本排外主义国策转变的希望；^②

“千岁丸”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又一表现是，日本人乘员登岸伊始，每至一处，即围观者如堵。造成此等轰动局面，除因日本武士发髻、服装特异，又腰佩双刀，颇令沪上民众讶异外，更重要的是，围绕日本人的来访，上海坊间正流传着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与上海紧张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③

“千岁丸”抵沪的1862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正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中外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作为《南京条约》规定的对外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因特定的区位优势，经20年开埠，早已超过广州，成为位居中国第一位的外贸港口，而且是东亚最繁盛、最西洋化的大都市，上海正演绎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会的悲喜剧，决定晚清社会命运的重大事件在这里展开……

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1850年8月（道光三十年七月）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又

① 幕府：军队出征，使用帐幕，所以中国古代将军署称“幕府”。日本仿此，把12~19世纪武家制度下掌握国家实权的征夷大将军的府署称“幕府”，先后出现过镰仓幕府（1192~1333）、室町幕府（1338~1573）、江户幕府（1603~1867）。室町幕府因将军姓足利，又称足利幕府；江户幕府因将军姓德川，又称德川幕府。

② 详见本书第二章结尾。

③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



名《北华先驱周报》或《先锋报》)于1863年初发表社论,评议刚刚过去的1862年说:

这显然是中国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倘若对此一一叙述,那要写成多卷本的书。^①

一周后,该报又载文指出,1862年,全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焦点在上海,或与上海密不可分。上海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舞台。^②

1862年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年初发生“坂下门外之变”,幕府执政的老中安藤信正被水户藩士刺伤,标志着攘夷倒幕之风的炽盛;紧接着,大将军德川家茂与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举行婚仪,时称“和宫下嫁”,这一政治联姻是“公武合体”以平息“倒幕”风潮的不成功尝试;而西南雄藩崛起之势有增无减,长州藩主毛利氏建议改革幕政,又奏请“攘夷”,萨摩藩主监护岛津久光率藩兵入京都……与此同时,幕府开设的研习洋学的蕃书调所改称洋书调所,幕府派出留学生赴欧洲……总之,这是日本“开国”初期一个充满变数的时段,危机与希望并存。

在疑云密布的东亚海陆交界处,日本幕府官船“千岁丸”带着怎样的使命,于1862年这个“中国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来到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焦点”上海?使团的幕府官员(“幕吏”)及随行的诸藩武士(“藩士”),在上海获得了哪些见闻,引发了怎样的思考?这些见闻与思考对日本的幕末维新乃至以后的明治维新起到怎样的作用?在中日两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千岁丸”上海行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随着本书的徐徐展开,笔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探究这些问题。

① 《北华捷报》1863年1月3日。当时英国人站在广州位置上,称上海及长江流域为“北华”、“华北”、“北方”。

② 《北华捷报》1863年1月10日。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1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1
二、“开国”的力度与主要方向	9
三、日本幕末的“对清策论”	18
四、以上海为渡航清朝的首选目的地	24
五、四次遣使上海	29
第二章 “千岁丸”——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	34
一、宽永以降不平衡的中日交通	34
二、幕末打开对清交通的努力·“千岁丸”的选购	37
三、“千岁丸”的使命	40
四、“千岁丸”乘员及其上海纪行文	43
五、高杉晋作与五代友厚	51
第三章 初识上海	67
一、长崎启程，千里风涛东海航	67
二、无炮的吴淞炮台·壁垒森严的上海城垣	72
三、中外船舶林立的巨港	77
四、华洋二界比照	85
五、“战败条约”笼罩下的屈辱	94



六、官府的排场与内囊空腐·····	101
七、围观文化·····	104
 第四章 “太平战事”与“清洋会剿” ·····	 108
一、幕末日本对太平天国的关注·····	108
二、炮声隆隆，满目兵戎·····	115
三、搜集太平战事文献·····	120
四、着眼曾、李，了解清朝军政格局变迁·····	123
五、淮军阵营探查·····	130
六、从“华洋会防”到“华洋会剿”·····	137
七、“清、倭、英、法共剿”的传说——再析“围观文化”·····	147
八、洋兵跋扈·藩士质疑清方借洋自保策·····	148
九、侧面探询太平天国情状·····	154
十、太平天国否定论及其对近代日本的影响·····	163
 第五章 色彩斑斓的社会风貌 ·····	 168
一、难民潮涌·····	168
二、鸦片泛滥·····	175
三、洋教传播·····	182
四、洋学译介·····	186
五、青楼遍布·····	197
六、民风：淳厚与刁滑·····	201
 第六章 日清贸易的新拓展 ·····	 204
一、从“居贸易”到“出贸易”·····	204
二、长崎会所商人及所携日本出口商品·····	209
三、《道台府应接书》·上海当局对幕府商贸诉求的反应·····	213
四、藩士们的市场调查及购买蒸汽船的尝试·····	217
五、运回日本的货物及此行贸易收支·····	221



第七章 东亚文化圈内的协奏与变奏·····	224
一、东亚文化圈内涵·····	224
二、笔语·····	229
三、书画弈棋交往·古董鉴赏买卖·诗文酬唱应和·····	234
四、认同与离异·····	240
五、友谊与摩擦·····	245
六、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比较·····	254
结语 “千岁丸”上海行的历史定位·····	262
一、开 17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人踏访中国之先河·····	262
二、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转折的起点·····	264
附录 “千岁丸”乘员上海纪行文选辑·····	272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 刘柏林译·····	272
日比野辉宽：《赘疣录》 刘柏林译·····	292
《没鼻笔语》 冯天瑜点校·····	343
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 皮细庚译·····	365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游清 ^{日记} 序·航海日录·上海淹留日 ^{五录}	
录·续航海日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 李雪梅点校、译	
·····	385
颇有奥义·····	409
后 记·····	414



第一章 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拍枕海潮来， 勿再闭关眠；
日本桥头水， 直接龙动①天。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一大转折便是从分散走向整体，其重要表现和结局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个封闭的国度壁垒森严的门户被打破。

在中世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诸国度，各自分散在孤立的环境中，为了防范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干扰，这些国度不惜“自我幽闭”。如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次下令“禁海”：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廷严禁民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外贸，1402年（明建文四年），永乐皇帝登基诏书重申海禁，翌年（明永乐元年），下令将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无法远航；② 1645

① 龙动，即伦敦，英国首都。

② 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的有力支持者。他在发动“宣威海外”的皇家远航的同时，又是民间航海的严厉禁止者。而且，作为帝王某些政治、军事意图产物的“郑和下西洋”，一旦失去倡导者的支撑，也就嘎然而中断，无以为继，与几十年后为寻求市场而启动的欧洲人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的世界性远航的一发不可收，形成鲜明对比。



年（清顺治二年），为防范郑成功（1624～1662）从台湾发兵闽浙，取代明廷统治中国的清廷“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①，1661年（顺治十八年）又颁布“迁界令”，禁止一切船舶出海。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1670～？）降清，翌年，清廷废“迁界令”，颁“展海令”，海禁松动，但对外贸易限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口岸，乾隆间更限制在广州一口。雍正间较康熙间进一步放宽海外贸易，却又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洋和久居国外。

与明清时代的中国相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海禁”更为严峻。早在江户时代以前的丰臣秀吉时期（16世纪后期）即开始禁教，德川幕府二代将军以降，为了控制大名、治理民众，竭力垄断贸易，制止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不断扩大的影响，1613年（庆长十八年）发布天主教全国禁止令，驱逐天主教传教士，镇压日本信徒；1616年（元和二年）将外贸口岸限定在平户、长崎；1633年（宽永十年）强化始于1604年（庆长四年）的“丝割符制”，限制从明朝输入白丝，以防日本白银过量外流；同年宣布，除官派“奉书船”外，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出航海外，曾经在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时期颇为兴盛的朱印船贸易中止。这便进入史称的“锁国”时期。其实，当时的日本并未使用“锁国”一词，倡导这一政策的新井白石（1657～1725）的用语是“异船御禁止”（禁止外国船往来），近藤守重（1771～1829）的用语是“海禁”（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和走私贸易），幕府屡次下达的禁海命令，也没有“锁国令”名目。“锁国”一词首见于文献，是17世纪来日的德意志人检夫尔（Kämpfer Engelbert, 1651～1716）所著《日本志》所附论文，题目为《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长崎兰学家志筑忠雄于1801年将其译成日文，题为《锁国论》，“锁国”一词始用于此。至19世纪中后叶，当人们意识到幕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便普遍用“锁国政策”

^① 王之春：《国朝洋务柔远记》卷1。



一词概括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的幕府对外方略。^①

1633 年至 1639 年（宽永十年至十六年），幕府五次颁布限制外国船来航、禁止日本船出海的政令（史称“锁国令”），不许日本人同外国人接触，禁止建造大型船舶，日本船不得出海渡航，不准在海外的日本人归国，潜回者处以极刑，除中国、荷兰可在长崎保持有限通商关系（1641 年令荷兰商馆从九州西边的平户迁至长崎的出岛），朝鲜可在对马岛进行小型近海贸易外，断绝同其他国家的商贸关系。^②此后，幕府仅依靠荷兰和中国驻长崎商馆向主管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提供的报告书（“风说书”）了解外部世界形势。由担任汉语翻译的唐通事询问入长崎港的唐船船头（货主）后写成的报告书，称“唐风说书”^③，亦称“清商口单”；由担任荷兰语翻译的和兰通事询问入长崎港的荷兰商人后写成的报告书，称“和兰风说书”，亦称“阿兰陀风说书”；另外，由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其他外国商人口述译成或摘译外国报纸新闻的报告书称“别段风说书”。这些“风说书”仅供幕府内部阅读，对民众是保密的。不过，幕末“风说书”经翻译者、传递者透露，在各藩国和民间扩散开来，成为各界人士了解域外情状的一大消息来源。日本“开国”以后，“阿兰陀风说书”由荷兰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荷兰总督府的机关志《*Javasche Courant*》取代。1862 年（文久二年）起又发行一种十余页的新闻书，名《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用木板印刷，此为日本最早的新闻印刷品。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序论，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② 参见大熊真：《幕末期东亚外交》，乾元社，昭和十九年十月初版，第 16～17 页。又参见大庭脩：《江戸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 1997 年 7 月版，第 3 页。

③ 江戸时代的日本人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国”，称中国船为“唐船”。其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对唐朝有深刻印象，故以“唐”指代中国；二是郑成功由不屈从清朝的明人意识出发，称自己是唐王（朱聿键）属下的唐人，这一称谓对江戸时代的日本人颇有影响。后说参见大庭脩：《江戸时代日中秘话》，第 17 页。